

文化先驱的矫健身姿

——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历史地位研究

周晓平 著

嘉应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14059768

K827
2158

嘉应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科学术丛书

文化先驱的矫健身姿

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历史地位研究

周晓平 著



北航

C174698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8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先驱的矫健身姿：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历史地位
研究 / 周晓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

ISBN 978-7-5161-4488-6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黄遵宪 (1848 ~ 1905) —人物
研究②黄遵宪 (1848 ~ 1905) —文学研究 IV. ①K827 = 52
②I20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75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王福仓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7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钱振纲

晓平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修订后准备出版，嘱我写几句话。2008年至2011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期间，我是他的指导教师。写序的要求，似乎没有理由推托。谈些什么呢？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谈一下他这篇论文的选题过程，或许会有助于读者。

这篇论文的选题是我与晓平一起商量确定的。选这个论题时考虑的因素之一是晓平具有研究这个题目得天独厚的条件。晓平进入北师大学习之前，是广东梅州市嘉应学院的教师。梅州市是著名的“客家之乡”。那里人杰地灵，曾涌现出不少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客家民系的杰出人才。黄遵宪是其中之一。晓平身在梅州的高等学府，有研究客家文化和黄遵宪的有利条件。而且据我所知，他在此前已经对客家文化和黄遵宪有了一定的研究。

当然，我们将黄遵宪确定为晓平博士论文的选题，并不仅仅因为他具有研究这个题目的学术优势，同时也因为黄遵宪这位重要的文化人物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无可否认，此前的黄遵宪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自然是新加坡华人学者郑子瑜的开拓之功。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黄遵宪的研究也不可忽视。诸如黄遵宪的外交活动、政治活动、政治改革思想、文化变革思想、诗歌创作、诗学理论以及他的思想和创作与客家文化的关系，

等等，几乎都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探讨。然而虽然如此，我们却认为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最值得探讨的就是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史研究界是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四个大的段落的。这种可以被称为“四分法”的断代方法至今仍然在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但这种断代方法不是通过分析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获得的，而是将某种社会史的断代结论硬套在中国文学史上而形成的。依据这种断代方法所建立的研究格局，不利于探讨中国文学由旧到新的变革过程，因而也不利于探讨黄遵宪在中国文学由旧到新的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这种文学史研究框架中，前有龚自珍，后有梁启超，黄遵宪不过是中国近代文学史当中一位较为重要的作家而已。如果抛弃这种人为割裂文学史的断代方法，依据实际情况去考察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过程，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特殊地位就会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

从文学自身变化的角度考虑，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应作为给中国文学断代的一个标志。不错，作为一个主要因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引发内应并从而发生现代化变革的国家，鸦片战争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预示着中国此后将发生一系列现代化变革。然而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些文学史著作为了说明 1840 年鸦片战争立即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变化，不惜将 1841 年就离世的龚自珍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将龚自珍大多写于 1840 年之前的诗文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开山之作。这显然是非常牵强的。龚自珍深受明代后期重情、重个性、重童心等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又接受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在封建末世大放了“怪魁”的异彩。他在中国近古文学史中自有其重要的地位。但他的创作基本与鸦

片战争无关，对此后中国新文学的建构影响也很小。就实际情况而言，黄遵宪才是在西学东渐大环境下为中国新文学建构提供理论和创作资源的第一人。1868年，他在《杂感》一诗中就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创作主张。在完成于1887年而刊行于1895年的《日本国志》一书中，他又对言文一致的重要性做出了论述：“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如果说他的这些主张和论述为此后中国文学变革的某些方面指明了方向，应当不是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新派诗”。这些“新派诗”虽然还没有完全打破旧体诗词形式上的束缚，但思想和语汇的现代色彩已经十分明显。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发生不能说与黄遵宪的种种影响和参与无关；而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又是真正催生了中国新文学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因此，如果拨开“四分法”断代格局的迷雾，黄遵宪作为中国新文学报春第一燕的历史定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从中国新文学建构的视角对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进行研究也应当是有意义的。

正是出于上面这些考虑，我与晓平感到可以将探讨黄遵宪在新文学建构中的历史定位和具体影响作为他博士论文的基本切入角度。选题确定后，晓平就投入了认真和艰辛的撰写过程。由于有完成这一课题的优势，他不仅圆满完成了论题预设的任务，并且新见迭出，尤其在黄遵宪受客家文化影响和对民间文学资料吸收方面。可以认为，这部专著的出版将是对黄遵宪研究一个不小的推进。当然，如果按高标准要求的话，论文中也仍有一些可推敲和润色之处。

晓平为人很热情真诚。我们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我为他博士论文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2013年1月4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钱振纲 (1)
绪 论	(1)
第一章 启蒙思想的现代性轨辙	(16)
第一节 感愤体验与寻找民族发展之路 ——《日本国志》撰写的强烈动机	(16)
一 进化发展的认识论——面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姿态 ...	(19)
二 “变革”是硬道理——“用夷变夏”的倡导者 ...	(29)
三 倡导“以言救世之职”与寻找民族出路相契合 ...	(34)
第二节 “经世致用”的学术核心与“诗歌之用” ...	(38)
一 “经世致用”学术核心的现代凸显	(39)
二 “诗歌有左右世界之力”	(49)
第三节 “西学墨源”的背后	(56)
一 墨子思想在晚清的复兴与再运用	(56)
二 黄遵宪“西学墨源”的内涵与外延	(57)
第四节 现代文化意识的视野与价值取向	(67)
第二章 书面语变革的最早诉求	(73)
第一节 从感性到理性	(73)
一 言文相“离”的焦虑	(74)
二 “言文一致”的第一次最明确表述：“我手写 我口”	(81)
三 “言文一致”与进化论思想	(94)

四	“言文一致”与中外文化交流	(101)
第二节	书面语变革的原因考察	(106)
一	书面语变革的基础——从文字的简易到 语言革新	(106)
二	“言文一致”的依据——书面语变革的实质 ..	(112)
三	“言文一致”的标准——书面语变革的目标 ..	(118)
第三节	书面语变革的“缺憾”与拓展 ——“言文一致”后续探讨的难题	(122)
第四节	历史地位与影响	(130)
第三章	“新派诗”创作的第一人	(134)
第一节	革故鼎新的心声	(134)
一	新派诗：激情、保守与“既破且立”	(134)
二	“别创诗界”与新老共赏	(145)
三	“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兼论新词入旧诗 ..	(155)
第二节	感时忧世的情怀	(165)
第三节	亘古未见的世界视野	(170)
第四节	渐趋自由与通俗的诗体	(175)
一	追求自由与通俗的诗歌	(175)
二	与“五四”新诗关系重新定位	(184)
第四章	民间文学、民俗资源利用的自觉与对新文学的 建构	(196)
第一节	民间的发现	(196)
第二节	民歌情结与诗歌创作的“杂歌谣”化	(204)
第三节	新思想与新形象	(211)
一	现代民俗思想的最早阐释与新文学民俗思想的 滥觞	(211)
二	客家女性意识与客家风土人情——女性观与 “乡情长卷”诗	(218)

三 异域风光——《入境庐诗草》与《日本杂事诗》 的奇特与新颖	(238)
第四节 对民俗、民间文学的重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 打开思路	(245)
第五章 对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积极倡导和参与	(256)
第一节 诗界呼号有旗手	(256)
一 与“诗界”的革命、思想的启蒙	(256)
二 与“诗界革命”的理想与目标的追求	(261)
第二节 “文界革命”：不单纯的影响和接受	(267)
第三节 小说理念与“小说界革命”	(276)
余论 对中国新文化建构的阐释	
——由对中国新文学建构所引发的思考	(289)
第一节 诗歌美学思想有待研究的难题及其现代 阐释	(291)
第二节 对中国新文化的建构	(297)
参考文献	(302)
后 记	(319)

绪 论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是指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问题，包括文学的社会运行机制、文学观、文学的创作语言、体裁、题材、艺术方法等形式与内容向现代的转化，即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正如王瑶先生认为：“思想的现代化”、“语言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三个层次总结“五四”追求的现代性，强调“我们今天仍然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①。中国文学势必也仍然处在正在进行时，本书无意也无力于断定和预测中国文学现代性所有问题，故将视点定格在此问题的其中一个关键点——“新文学建构”，即主要把视点锁定在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开端与确立的初级阶段，它恰恰为整个中国文学现代性走向奠定了根本的基调，也是其生存、发展赖以存在的源泉。本书从“人的思想现代化”出发，试图发掘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所肩负的历史关键角色及其学术建构的历史贡献。

以黄遵宪在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历史地位作为研究论题，目的是想通过对黄遵宪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变的关键性阶段其启蒙思想、文学思想的探讨，认识中国文学是如何移步换形地变化、发展的。具体到诗歌方面，印证黄遵宪与“诗界

^① 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革命”的关系；与现代白话文变革及其建构；与现代文体变革、艺术形式的创新；与诗歌美学的现代性阐释……诸如此类的学术问题。从而论证黄遵宪在这个特定的转型时期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历史地位。

一 学术回顾：黄遵宪的文学思想研究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署人境庐主人、任斋主人、东海公、岭东故将军、拜鹃人、老少年国之老少年、观日道人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客家人。祖上因典肆发家。他的祖父黄际升经商。父亲黄鸿藻（字砚宾，号逸农）1856年中举，先后做过京城与地方官，著有《逸农随笔》、《退思书屋诗文稿》等。^①家庭的熏染，使其在少年时代就显示了诗歌天赋，被当地人喻为“神童”。10岁时私塾曾以杜甫“一览众山小”命题令其作诗，年幼的他当即破题：“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前山”^②，出语之大气，使塾师甚感惊讶。此事表现了黄遵宪的艺术天才，同时体现了他从小就有的宏伟之志。

清光绪十七年（1891）黄遵宪出使新加坡总领事。那个时候梁启超、康有为对黄遵宪诗歌都有些许的评论，周作人对黄遵宪的诗歌也有所评价。

对于黄遵宪的研究，还得从郑子瑜先生谈起。郑子瑜出生于1916年，由于战乱的原因，成年的郑子瑜迁徙于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公民。郑子瑜对黄遵宪的诗歌很感兴趣，广泛地收集黄遵宪史料，并咨询熟悉黄遵宪生平事迹的有关

^① 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②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载《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9页。

人士，如华侨长辈、黄遵宪的侄子伯陶及王仲厚等人。他著有《诗人黄公度羁马事迹考》、《谈黄公度的南游诗》等。1959年，郑子瑜写就第一本黄遵宪研究专著《人境庐丛考》，蜚声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郑子瑜借助早年从事学术活动的平台——南洋学会，发表了部分学术成果。1958年，王赓武先生接任学报主编，因了解郑子瑜在黄遵宪诗歌方面的研究成就，请他担任黄遵宪专号主编，并在60年代提出“黄学”研究。

事实上，对于黄遵宪的研究，三四十年代为初发，及五六十年代尚具规模。60年代初，郑子瑜先生倡导建立“黄学”，引起海内外专家的重视，并得到学者的趋同。“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遵宪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反思、超越和突破郑子瑜所开创的“黄学”而展开的。历经一个甲子，“黄学”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从诗歌文学到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领域。而其中评判更多的是从史学的角度对黄遵宪的政治活动、维新思想展开论述。对黄遵宪的研究在诗歌文学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在新的世纪里，研究这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和文学巨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典型的意义。

本书对于黄遵宪的研究定位在文学方面，对于黄遵宪在史学方面的研究则不做过多的论述，以免节外生枝。

从文学的角度研究黄遵宪，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大约100多篇。讨论的重点问题有^①：第一，在客家文化、民间文学视野下，论述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学者认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深受客家文化的影响；黄遵宪的诗歌

^① 参见黄升胜《黄遵宪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7页。

创作也与日本民歌有深厚渊源。^① 张正吾、钟贤培、黄保真、管林、张永芳相当程度地阐述了黄遵宪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黄遵宪始终如一地重视民歌和主张诗歌的通俗化；张永芳指出“民歌对黄遵宪创作‘新体诗’也确有启发”。第二，黄遵宪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成就。^② 一些论文深入探讨了黄遵宪在不同时期提出的诗论，对其诗歌理论、创作成就和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做出评价；对黄遵宪诗歌在语言、意象、形式等方面的艺术创新做了阐释，评价其对中国诗歌现代化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研究者指出黄遵宪早年提出“我手写我口”主张的文学史价值与

① 管林：《黄遵宪与民间文学论丛》；张永芳：《黄遵宪与日本民歌》，《北京晚报》1982年6月12日；夏晓红：《黄遵宪的“新派诗”与民歌》，《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1辑；谭赤子：《黄遵宪诗歌中的客家风情及其它》，《岭南文学史》1985年第1期；钟俊昆：《客家山歌的文化阐释》，《嘉应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周晓平：《客家文化土壤中一枝鲜艳的奇葩——论作为重要课题研究的客家民间文学》，《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等。

② 管林：《辟新诗境、创新诗风的黄遵宪》，《广州研究》1984年第3期；黄保真：《黄遵宪文学思想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6期；郭延礼：《黄遵宪的开放意识及其诗歌的审美取向》，《嘉应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张应斌：《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嘉应大学学报》2005年第2、4期；魏中林：《黄遵宪、梁启超诗歌改革异同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林衡勋：《“诗外有事，诗中有人”——黄遵宪诗美学纲领》，《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谢冕：《19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黄遵宪》，《嘉应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左鹏军：《钱钟书论黄遵宪述说》，《华南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杨宗泽：《黄遵宪诗品钩沉》，《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龚喜平：《融入异帮之新声 汲取民间之营养——黄遵宪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两大贡献》，《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张永芳：《试论黄遵宪诗歌创作的成就》，《嘉应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张永芳：《黄遵宪和“新世界诗”》，《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张永芳：《黄遵宪与诗界革命》（上、下），《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冰冰：《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郭真义：《黄遵宪和他的故乡诗友》，《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关爱和：《黄遵宪的诗学理论》，《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周晓平：《黄遵宪与客家民间文学的互动》，《济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

意义；剖析了其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高度评价了黄遵宪作为晚清一个重要诗人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所建立的历史功勋；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了黄遵宪、龚自珍、梁启超等人诗歌改革理论之异同，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第三，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关系。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将黄遵宪尊崇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性人物的观点，在学术界形成了有效的“交集”。认为黄遵宪的诗歌对革新主张、诗歌创作实践与晚清“诗界革命”乃至中国文学的历史转型均产生重大影响。第四，《日本杂事诗》研究。一些学者从《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的对比关系研究中，考证了《日本杂事诗》初刻本与定本的异同，从不同时期的不同阶段，考察了黄遵宪文学理论发展的心路历程。第五，《人境庐诗草》研究。它主要体现为黄遵宪“新派诗”的主要思想和内容，集中表现了黄遵宪“新派诗”的创作成就；涉及《人境庐集外诗辑》的相关作品，不少论文对黄遵宪诗歌的内容题材、创作道路、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者认为，从诗歌中可以看出黄遵宪历史变易观和晚清文化觉醒的思想历程。^①第六，专门对黄遵宪有关小说的建设性意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②，

① 吴剑青《黄遵宪的诗歌理论和〈人境庐诗草〉》的内容包含五个方面：宽广的诗歌题材；忧国忧民的精神；铺叙和刻画各种人物；“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取法民歌格调与民歌精神。张永芳《黄遵宪诗艺散论二题》则从两个方面阐释人境庐诗的特点：一是组诗和长诗；二是散文化的努力。管林《辟新意境、创新诗风的黄遵宪》对人境庐诗的艺术形式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概括：题材广而新；体裁多而杂；句子与篇幅长。指出，黄遵宪是“新派诗”理论与创作的重要实践者；是晚清至现代转型时期的杰出诗人。钟贤培《论黄遵宪的诗歌》认为其诗“为五四时期白话诗的出现起了先驱作用”。

② 任访秋尝在《黄遵宪》中指出，其诗歌创作主张现实主义，小说要反映现实生活，有人有事。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名著中有价值的东西。蔡景康《黄遵宪小说见解述略》指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日本国志》中论及小说的重要意义，认为黄遵宪是小说理论的先行倡导者。《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的思想观点，为小说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其散文相关主张进行了高度评价。^①认为黄遵宪“热情鼓吹‘小说界革命’，在理论上纠正了梁启超的某些偏颇；在翻译问题上所陈述的一系列主张，颇能补充严复的不足，应该说是‘文界革命’理论的重要文献”。论文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黄遵宪的小说见解，认为其见识高于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人。第七，黄遵宪诗歌作品研究赏析、辑佚及其他。钱仲联与尤振中合作撰写了《黄遵宪评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黄遵宪的生活、思想的发展轨迹，对其诗歌理论、诗歌创作成就、诗歌作品的理论色彩、文学艺术的变化、不同风格的表现等进行了有的放矢的阐释。

文学论著方面也有一些，徐永端《黄遵宪》主要从文学史的角度介绍黄遵宪的生平事迹、诗歌理论、创作成就及其独特的诗歌艺术，并旁及其他的变法活动；张永芳《黄遵宪研究》、《黄遵宪新论》、《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等多部论著，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作品赏析、佚作钩稽等方面。还有研究者以黄遵宪作为硕士或博士的学位论文的选题。^②论文尚且不多，但这些选题从不同侧面深化了黄遵宪文学思想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黄遵宪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反思、超越和突破郑子瑜所开创的“黄学”而展开的。然而，在研究黄遵宪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功利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读现象，或套现、或嫁接、或生发、或淡化、或遗忘。

① 黄保真《黄遵宪文学思想简论》指出：“黄遵宪虽然没有提出‘白话文’一词，但在中国近代要算是最早的先驱了。”

② 主要有黄升任《黄遵宪与晚清“自改革”思潮》（复旦大学历史系2000年博士论文）、刘冰冰《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黄遵宪诗歌研究》（山东大学中文系2003年博士论文）、邢丽凤《黄遵宪与客家民间文化》（山东大学中文系2003年硕士论文）等。

这种研究困境的存在，就使得黄遵宪的研究有待较深的挖掘。深感遗憾的是：无论在思想史还是在文学史方面，学术界都没有把黄遵宪置放在一个应有的高度进行研究。比如，在思想方面，谈到戊戌维新变法，人们自然会想起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而对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启蒙家和领袖之一的黄遵宪了解甚少（维新变法的思想其实质源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黄遵宪是维新变法幕后的倡导者与引导者。对此问题，本书没有过多地展开讨论，以免节外生枝）。比如，诗文领域，在古代到现代诗歌转型中，因为过分强调梁启超的作用而误置了黄遵宪的历史地位（笔者认为，梁启超是一个了不起的宣传家、鼓动家，这是事实，但诗歌创作并不多。当然他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有关诗歌的理论。黄遵宪无论在诗歌的创作，还是于诗歌的理论建构都有实质的成就，这是梁启超难以企及的。正文将展开详细论证）；甚至有人认为黄遵宪并不是“诗界革命”的实际代表者；另有论者认为黄遵宪的诗学革命和实践与“五四”新诗的发生是两种不同路上的诗歌变革，不宜定位为直接的源流关系……这些疑难，都需要研究者进行认真严肃的辨析。又比如，黄遵宪在谈到《日本国志》的时候，他提出“西学墨源”论这样重要的思想，研究者讳莫如深，或者避重就轻，或者避而不谈。“西学墨源”由晚清至现代在中国文化的转型中有何影响？又有何现实导向意义？诸如此类问题，尚需人们进一步去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带着这些疑难，笔者以本论题为中心，试图进一步揭开历史的面纱，追根溯源，抛砖引玉，从而把对黄遵宪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应有的新水平。

目前对于黄遵宪的文学思想的研究尚处于进一步升华阶段。对于黄遵宪在学术史、文学上的地位，一直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并未形成有效的“交集”。尤其对其在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历史作用研究不多，研究成果捉襟见肘。对于黄遵

宪文学思想的研究，尚缺乏将其置于中国古代、现代转型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从而对其价值与地位做出更科学的估价；对黄遵宪诗文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的评价，也只是零零碎碎散见在一些论文里，而鲜有从传承创新与艺术审美的高度对其进行系统的论述；尤其少有研究者将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绩还原到中国古代、现代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的极具特色的文学氛围中进行讨论，从而认识他对中国诗文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构与启迪^①。

其次，黄遵宪思想观、文学观的形成依据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在人们心中的难题。笔者认为，黄遵宪思想观、文学观的形成依据，一是社会环境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发展契机，这是外部条件；二是客家“母根文化”的影响为其奠定了深刻的思想理念，这是内在依据。黄遵宪作为第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古典诗人，他的诗歌反映的现代文化意识与客家人特性不无密切关系。从中国客家乡土社会走出来的黄遵宪，其精神品格里具有浓厚的中国农业文化的价值取向，这不但丝毫不碍于他作为一个从古代过渡到现代特定时代的晚清关键人物的条件规定，恰恰折射了身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裂变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化、感情与志趣等心理特征。文化的转型真正预示着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人们都带着一个与传统无法彻底割断的影子，历史与现实、人生与宇宙、感情与理智、价值判断与思维定式的方方面面，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阵痛，这也是许多人一直存在着矛盾心境的深刻原因。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中，黄遵宪时时受着失落与痛苦的煎熬。或痛苦、或欢乐，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都是自然而然地和盘托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黄遵宪从

^① 参见左鹏军《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